

石榴花满旧琴台

——上海中国大戏院记往

张斯琦

盛夏初至，闲步南京路，欣然发现牛庄路上的中国大戏院已经整修完毕，正式开台营业了。这一座承载着近现代上海艺术发展与城市演进记忆的大戏院，再一次回到人们的视野。舞台上演的本是戏，而这座舞台与它见证的历史已然成了一幕大戏。

前身

回望近代中国的艺术史与社会史，京剧的兴盛与传播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章。上海，一直是京剧的一大重镇，风靡程度丝毫不亚于北京与天津。但不同的是，北京的京剧市场是名角挂牌的班社制，以主要演员组建的班社为演出单位，在各个戏园子里轮换演出；而上海则是剧院制，所谓“铁打营盘流水的兵”，剧院有专门的经营者，固定的班底，每期外请不同的演员来唱，开包银给这些约来的角儿们。翻看上世纪初到四十年代的《申报》，每天至少有一整版京剧广告，十多个剧场每晚同时开锣，周末还要唱日夜两场，如此繁华程度大概是今人完全无法想象的。

至今我们还能看到的，像天蟾舞台、大舞台、共舞台、兰心大戏院、美琪大戏院等等，都是那段历史留下的印记。在这些剧院中，中国大戏院其实是开张比较晚的。1930年，在牛庄路浙江路路口，建起了一栋西式建筑风格的剧院，正式开幕是在1930年1月，也就是中国大戏院的前身——三星舞台。这座舞台能容纳将近两千名观众，有三层楼。旧日的京剧演出没有麦克风，更没有随身话筒，但即使坐在三层最后一排，仍然能听得清清楚楚。三星舞台的营业，主要以上海本地演员的连台本戏《彭公案》《乾隆下江南》为主。1934年1月，谭富英、尚小云曾在三星舞台联袂演出《秦香莲》。

马连良与扶风社

十年后，1944年，更新舞台正式改名为中国大戏院。第一期演出，便请来如日中天的马连良与全体扶风社。当年1月24日，正是新春除夕，中国大戏院在晚九时隆重开幕。首先由黄金荣揭幕，接着由童芷苓、赵紫箫等坤伶剪彩。这位赵紫箫，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赵燕侠，当时只有十六岁。作为清台仪式，马连良、袁世海率领扶风社全体跳加官。然后马连良亲自扮演天官，与王吟秋、叶盛兰、袁世海、宋德珠同演昆曲《天官赐福》。这出吉祥戏，马连良平生绝少演唱，特为中国大戏院开台演了一次。压轴戏是宋德珠演《聚宝盆》。大轴，马连良与王吟秋、叶盛兰、袁世海、芙蓉草、高盛麟、茹富蕙演出《火牛阵》。《火牛阵》是马连良根据传统戏《黄金台》衍生而来的一出大戏，以此作为中国大戏院的开幕大轴，估计是取其红红火火之意。

扶风社阵容完整，王吟秋、叶盛兰、袁世海、宋德珠、高盛麟皆是充满朝气的新秀，一演就从1月24日到4月2日。马连良依次唱了《御碑亭》《法门寺》《摘缨会》《龙凤呈祥》《清官册》《打渔杀家》《胭脂宝褶》《群英会·借东风》《三娘教子》《苏武牧羊》《桑园会》《四进士》《楚宫恨》《一捧雪》《借赵云》《打侄上坟》《除三害》《游龙戏凤》《马义救主》《春秋笔》《广泰庄》《三顾茅庐》《打平嵩》《十老安刘》《要离断臂刺庆忌》《战北原·斩郑文》《八大锤》《反串八蜡庙》，几乎把马派戏唱了个遍，还唱了《洪羊洞》《空城计》《战樊城》《翠屏山》几出平时很少演的骨子老戏。《群英会·借东风》这种马派经典之作，足唱了有近百场。两个多月的戏码，大概顶得上当下一个马派京剧演员两年多的演出量了。扶风社的演出，真的为中国大戏院带来一阵东风。

此时京剧老生行中，余叔岩在1943年去世，孟小冬也淡出舞台。马连良已稳坐须生王座，正是春风得意之际。然而造化弄人，两年后他竟因曾赴伪满洲国演剧，被定为汉奸，倾尽家财才得脱罪。为了偿债，马连良多次在中国大戏院演出，心境恐怕与此时大不相同了。马连良的扶风社走后，中国大戏院当然不会让如此红火的场面冷落下来，接着便邀约同样地位的“四大名旦”之一荀慧生来续演。这一期演出又近两个月，几乎也是逐日客满，劫余的《荀慧生日记》1944年部分对此记载得很详细。中间荀慧生因为身体欠佳，由北京调来长子荀令香，父子同台，传为佳话。

此后，上海滩的名演员盖叫天、林树森、周信芳、黄桂秋、李如春等都长期在中国大戏院演出；光怪陆离的机关

布景、连台本戏《血滴子》《清宫秘史》，亦曾登上中国大戏院的舞台。四十年代的上海，是整个中国的时尚前沿，也是娱乐业的中心，中国大戏院就是那个时期的缩影。

梅程对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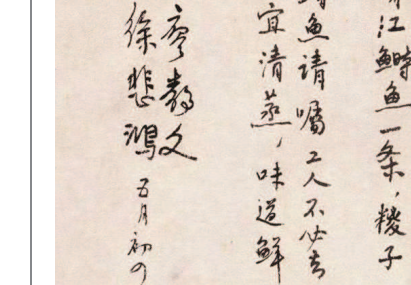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大戏院真正的辉煌，是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，蓄须明志、阔别舞台近八年的伶界大王梅兰芳重返舞台了。1946年11月，中国大戏院邀请梅兰芳与梅剧团演出营业戏，老生约了正值壮年的杨宝森，带上他宝华社的全体成员。没想到，同期天蟾舞台请了程砚秋、谭富英。于是，就有了那场京剧史上著名的“梅程对台”。

演员唱对台戏，在北平原不是稀奇的事。但在外埠，尤其是上海，就有些敏感了。特别是梅兰芳、程砚秋这般的顶级演员，还有师生之分。界内界外，全将目光聚焦于这场巅峰对台。中国大戏院梅剧团的演出开始在11月2日，头两天是梅兰芳的《苏三起解》。30年代之后，梅兰芳无论到哪里，头一天打炮戏都是《苏三起解》。一出最基本的旦角小戏，显示出他无以伦比的艺术水平与号召能力。到11月15日，天蟾舞台的程剧团正式开锣，程砚秋、谭富英演《全部玉堂春》，同天中国大戏院梅兰芳、杨宝森演《全部四郎探母》，一场大战拉开序幕。

这是一次真正正正可以称作对台的演出，因为不但是梅兰芳与程砚秋两个人，双方每一行当、每一层次都是铁两悉称。老生，梅剧团是杨宝森、哈宝山，程剧团是谭富英、张奎彦；花脸，梅剧团是刘连荣、王泉章，程剧团是袁世海、郭元汾；小生，梅剧团是姜妙香、俞振飞，程剧团是叶盛兰、储金麟；丑角，梅剧团是萧长华、韩金奎、刘斌昆，程剧团是慈少泉、曹二庚、李少广；武生，梅剧团是杨盛春，程剧团是高盛麟；武旦，梅剧团是班世超，程剧团是闫世善；老旦，梅剧团是何润初，程剧团是孙甫亭。票价上，中国大戏院是二万元到四千元法币，天蟾舞台是二万元到两千五百元法币。

对台从11月15日唱到12月26日，中国大戏院梅兰芳这边主要唱《四郎探母》《汾河湾》《樊江关》《审头刺汤》《贵妃醉酒》《法门寺》一类老戏。梅派本戏只贴贴《宇宙锋》《霸王别姬》《凤还巢》《廉锦枫》《西施》《黛玉葬花》；天蟾舞台程砚秋这边，则更多地贴出程派大戏《碧玉簪》《金锁记》《荒山泪》《红拂传》《青霜剑》《全部柳迎春》《春国梦》《文姬归汉》。唱到12月21日，程砚秋祭出了他的杀手锏——《锁麟囊》，并连贴五天，天天客满。12月24日，中国大戏院登台梅剧团参加南京国民大会的告示，暂停出演。12月26日，程剧团末场《文姬归汉》，结束了这期演出。

这一期演出之激烈，即使今天看来，还让人觉得有些芒刺在背，可想当时演员的紧张状态。上海滩的各种大报、画报、小报新闻不断。冯光光冯六爷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“日观天象”，看天气是否会影响上座。福芝芳福大奶奶也是每日惴惴不安。倒是梅兰芳本人不温不火，宠辱不惊。其间程砚秋还专程到梅府给师父师母请安。如今常有人为尊者讳，给这场较量打圆场，说是“艺术竞赛”“不伤和气”。2015年，我曾专门就此事请教过梅葆玖先生，据他回忆，父亲梅兰芳之前是跟程砚秋商量过的，并不希望出现对台的局面。但各种主客观原因，程砚秋始终坚持。



徐悲鸿与齐白石两位大师的结缘始于1928年底。当时徐悲鸿担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，开始酝酿教学改革，拟请木匠出身的齐白石为教授，经过三顾之请，齐白石才答应就任。之后二人开始了长达25年的交谊，直到1953年徐悲鸿去世。其间徐悲鸿对齐白石艺术的推扬不遗余力，所以，当齐白石一年后得知徐悲鸿已去世的消息，悲伤异常，九十多岁的他坚持要去徐悲鸿家拜祭，并执意跪下磕了三个头。老人的心中一直念着“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徐君”这句话。我们从北京画院收藏的徐悲鸿去世前一两年写给齐白石的一封信中（左图），亦可窥见二人交往之点滴：

梅兰芳心中多少是有些不快的。这前前后后梅程之间的较量与矛盾，也是历史，无须讳言。

这场对台谁输谁赢，自是众说纷纭。从售票来看，双方基本上是平手。而天蟾舞台座位比中国大戏院多，似乎程占了上风；若从剧目看，程剧团是全梁上坝，竭尽全力，梅剧团则有些闲庭信步，举重若轻，更胜一筹。

梅程对台结束仅十天，1947年1月5日，梅兰芳的爱徒李世芳遭遇空难离世，年仅26岁。业内外一片哀婉，梅兰芳更是伤心。2月27日、28日，京剧界在中国大戏院为李世芳遗孀唱了两天盛大的义务戏。第一天言慧珠、李玉茹、李蔷华、顾正秋、梅葆玖、裘盛戎等人合演《八五花洞》，大轴戏程砚秋、芙蓉草、俞振飞、袁世海合演《儿女英雄传》；第二天17岁的梅葆明、13岁的梅葆玖姐弟与李丽、赵荣琛、赵培鑫、陈大濩等人合演《四郎探母》，大轴李少春、高盛麟、袁世海等人合演《大溪皇庄》，剧中“十美跑车”一场，由言慧珠、李玉茹、魏莲芳、闫世善、李金涛、李薇华、顾正秋、秦慧芬、李丽、王萍十个旦角演出，颇集一时之盛。梅兰芳没有参加演出，而是登台讲话致谢，极为得体。对台是对台，程砚秋作为事实上的梅门大弟子，仍贵无旁贷地领导着演出的开始。这里与梅葆有着极深的渊源，可惜葆玖先生没能看到中国大戏院的重张。

孟小冬绝唱

中国大戏院八十多年的历史，这一方舞台上曾有难以计数的南北名家展示绝艺。若说最为人们铭记的，大概就是1947年9月孟小冬那两场《搜孤救孤》了。

1947年9月，正值杜月笙六十寿辰，要在中国大戏院举办十天演出，以“救济水灾义演”为号召，南北名伶差不多全部到齐。9月3日到9月12日，其中八天的大轴戏由梅兰芳领衔，三场梅兰芳、马连良、谭富英、李少春等人主演的《龙凤呈祥》，一场梅兰芳、筱翠花主演《樊江关》，两场梅兰芳、马



一九四六年中国大戏院，梅兰芳、杨宝森演出《汾河湾》

连良主演的《打渔杀家》，两场梅兰芳、李少春、周信芳、谭富英、马连良主演的《四郎探母》。而9月7日、8日两晚的大轴戏，则是数年来登台的最小冬演出两场《搜孤救孤》，是她告别舞台的收官之作。

如今唱余派的演员，没有不会《搜孤救孤》的。1925年余叔岩在高亭公司灌制唱片，灌了其中“娘子不必”“白虎大堂”两段。实际余叔岩在舞台上很少演这出戏，只唱过三四次。经他多次整理之后，教给孟小冬。最终还是孟小冬把《搜孤救孤》真正唱红了。1947年这两场，完全称得上空前绝后。中国大戏院的戏票早早售卖一空，外间的黄牛将票价炒到几十倍。孟小冬则在几个月前，便开始与琴师王瑞芝，配演裘盛戎、赵培鑫等人在杜公馆排练。无论演戏的，还是听戏的，所有人的心气都碰到了一起。

演出当天，前后台挤满了人，都在等着孟小冬出场。留存下来的现场剧照，还能隐约看到台帘后的一双大眼睛。当时的电台和私人，用蜡盘、钢丝带留下了多份录音。虽然杂音很多，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当时场上的凝重气氛。孟小冬的演唱，充满空灵感，几乎精妙到每一句都有亮点，逢唱即有彩声。要知道，这场演出，几乎整个京剧界的名老生全在现场看着，压力之大可想而知。现场能发挥到如此稳定又洒脱的程度，在存世的所有京剧实况录音中，这两场《搜孤救孤》真是达到舞台表演的极致了。

以往流传的《搜孤救孤》录音，均是同一天晚上的版本。经过仔细比对，有一种录音与其他版本有差异，特别是几个唱腔的地方不一样，说明两天演出各有录音留存下来。

那两天晚上，很多无法亲临现场的人通过无线电收听《搜孤救孤》。其中有一位特殊人物——梅兰芳。据姚玉英的回忆，梅兰芳在收音机前连着听了两天。如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收藏目录上，有一份孟小冬《搜孤救孤》钢丝录音，来源一栏写的是“梅院长家藏”。随着许多史料的面世，对于梅孟之恋，以前有很多说法不攻自破，但又浮现出了很多谜团。也许梅兰芳、孟小冬、福芝芳、冯光光、杜月笙诸人的关系，既不像后人想象得那么复杂，更不像后人想象得那么简单。

此后，孟小冬再未登上舞台，1949年随杜月笙全家赴港，1967年赴台，1977年逝于台北。两场《搜孤救孤》既是绝唱，亦是中国大戏院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幕。

许浑有诗说“尽日伤心人不见，石榴花满旧琴台”，当年让人沉醉的歌者，身影早已随风而逝。可是当看到他们曾经挥洒过的舞台时，还是会觉得其人未远。那些形象，那些声音，那些往事，总会穿越时空而来，在今古永恒。



1946年中国大戏院，梅兰芳、萧长华演出《苏三起解》



1946年11月15日，《申报》演出广告

我瞥见了无限辽阔的一角

黄德海

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。那时我在一座滨海城市上学，大一元旦前日离校访友，没有提前通知，希望能给对方个惊喜。不料朋友没像以往那样悠闲地待在宿舍，他已经提前一天去登泰山，我那点可怜的旅费也不足以支撑自己一起去小天下，只好买了当天的车票返回。不料路上开始下雪，车慢得让我在路上完成了一次跨年，手指冰冷的感觉在心房边缘锯子一样拉动，从车上下来，我双脚早已冻得发麻。时间已是凌晨，街头的旅店都抬高了价钱，我看看自己的钱包，只好背起行李，独自往学校走去。去学校的路环海，正是涨潮时候，浪花翻卷着湿湿铺雪的路，在大雪的映衬下，海显得愈加沉闷，哨声远远而清晰地传来，我忽然觉得天地无限寥落。

沉酣一觉醒来，桌上早已放着几个朋友寄来的他们所在大学的中文系阅读参考书目，是我此前几天写信索要的。那时身心的恢复速度快，我几乎已经忘记了晚上的经历，迫不及待地翻开书目读了起来，要选定几本接下来准备精读的书，《诗经》就在最初选定的几本里。当时的书目中，并没有《诗经》的版本说明，或许是列书目的人觉得无法取舍，或许跟胡适的认识一样，“必须撇开一切《毛传》《郑笺》《朱注》等等，自己去细细细读原文”。无论出于什么原因，我最初读的《诗经》，是从一个小书店里买来的白话注本，并且花了不长的时间一首首读完，凭感觉选定了七八十篇自己认为特别好的（主要是国风），作为一段时间的背诵篇目，然后就丢在一边。

再读《诗经》，是离这次五六年后了。其时张文江老师在讲《管锥编》十部书简义，我去蹭课，听完《毛诗正义》，顿觉豁然开朗，《诗经》在眼前呈现为一个精密的结构，内心有真切切实懂得了点什么的踏实。因了这踏实的激励，我从书堆里找出那本大学时的《诗经》，对照陈子展的《诗经直解》，参以《管锥编》和《管锥编》读解》，又完整读了一遍，把书上的空白处都密密麻麻抄上了字。贪心切切，我在读过这遍之后，虽然明知暂时不会再看，还是去买了《毛诗正义》《诗三家义集疏》《诗集传》囤积下来，仿佛这样就拥有了深入《诗经》的依傍。

两年多前，因为有感于时事，我写了两篇跟《诗经》有关的文章，一篇解《卫风·硕人》，一篇讨论国风里的俭德，自觉对诗而经的理解略有深入，可也感到自己的那点读《诗》心得都写在两篇文章里了，暂时不会再有涉及，就把文章收入《书到今生读已迟》，心里想的是就此收手。正在这前后，因潘雨廷先生的《诗说》基本整理完毕，我有幸根据手稿核过打印件，并在发表、出版前两次担任校对，得以在不长的时间内连续通读三遍，越看越觉得大声宏。那次在飞机上读完出版校样，我收拾起小桌板上的稿子，倚着座椅发了一会儿呆，感觉自己看到了《诗经》作为织体的内在纹理，古人的心力和精神景象有一部分涌现（aufgehen）出来，我瞥见了无限辽阔的一角，内里无比欣喜。

借着这欣喜的鼓舞，我边学边写，尝试着因应世事，映照精神，省察卓越者的深心，安顿自己不安的灵魂，在“经”的意义上重新擦亮《诗经》，于是就有了另外十一篇有关的文章。写作过程中不时遇到的发现的惊喜和对各种困难的克服，让写这些文章的过程变成了一次充满快乐的学习之旅，我借此知道了一点古人的格局，了解了一点他们深婉的心思，也通过这些检讨到自己的诸多不足，获得了进一步检视自己的机会。至于读与写过程中点点滴滴的心得，有些是原来的体会，写的时候有所损益调整；有些是新有所思，“如虫蚀木，偶然成文”。二者同样让人开心，我都尽可能认真地写在文章里了。

书名中的“消息”二字，来自《易经》丰卦卦辞“日中则昃，月盈则食，天地盈虚，与时消息”，希望自己可以通过对《诗经》本身及历来解说的涵泳，见天地之变动不居，世情之推移变迁，人于其间的经权之择。当然，这期望终于不免是奢望，那就合理地吧这一系列文章看成学习过程的报告，以如此简略粗疏的形式书写出来，肯定不能称得起是一个个大新闻，只算得上是一则则小消息——这也就是把这本小书命名为“诗经消息”的原因。

（本文为《诗经消息》自序，作家出版社即将出版）



《鲇鱼礼》与鲇鱼的故事

王永林

力，所以，当齐白石一年后得知徐悲鸿已去世的消息，悲伤异常，九十多岁的他坚持要去徐悲鸿家拜祭，并执意跪下磕了三个头。老人的心中一直念着“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徐君”这句话。我们从北京画院收藏的徐悲鸿去世前一两年写给齐白石的一封信中（左图），亦可窥见二人交往之点滴：

白石先生：兹着人送上清江鲇鱼一条，粽子一包，并向先生拜节。鲇鱼请嘱工人不必去鳞，因鳞内有油，宜清蒸，味道鲜美。敬祝节禧。徐悲鸿、廖静文五月初四。

徐悲鸿在端午佳节将至之际，专门安排人给白石老人送上鲇鱼、粽子等节日礼物，在信中还细心地嘱咐鲇鱼的烹饪方法，从中可见徐悲鸿对白石老人真切的无微不至的照料与关怀。此札书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（因所用信笺为“中央美术学院”专用笺，而中央研究院定名为1950年4月，悲鸿1953年9月去世，故断定写于1950年至1953年间），至今已有六十多年了，读此札可知鲇鱼之贵重，亦可证悲鸿与白石之交谊，真乃艺坛之佳话也。

鲇鱼之名与贵，非始于今，古已如此。北宋梅尧臣就有《时鱼诗》：“四月时鱼遶浪花，渔舟出没浪为家。甘肥不入罟师口，一把铜钱趁笋牙。”（时鱼即鲇鱼）王安石《后元丰行》中也提到过鲇鱼：“……鲇鱼出网蔽江渚，获笋肥甘胜牛乳。百钱可得斗酒许，虽非社日常闻鼓。吴儿踏歌女起舞，但道快乐无所苦。……”

苏东坡亦有：“芽姜紫醋炙鲇鱼，雪碗擎来二尺余，尚有桃花春气在，此中风味胜莼鲈。”清初吴嘉纪作《打鲇鱼》诗：“打鲇鱼，供上用。船头密网犹未下，官长已备驛马送。观者候忽颜色欢，玉鳞跃出江中澜。天边举匕久相迟，冰填管护付飞箭。君不见金台铁瓮路三千，却限时辰二十。”则记录了明清以鲇鱼为进御贡品的史实。

身历康雍乾三朝的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，亦有诗赞鲇鱼曰：“江鲜鲜穿趁鲇鱼，烂煮春风三月初。分付厨人休靳尽，清光留此照推书。”黄钺在其所著《壹斋集》中，也有《鲇鱼》诗一首：“鲇鱼四月美绝伦，获网出光如银。头鱼人竞豪夺，千钱一尾充厨珍……”其时为清嘉庆年间，每年四月（阴历）芜湖江段之获港“网

出光如银”（银光乃鲇鱼之鳞），价至“千钱一尾”，可见其价之昂贵也。野生长江鲇鱼，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吃过，今长江已失鲇鱼之迹，数千年来也难野生鲇鱼一尾，故近二十多年来已久未闻其味矣。鲇鱼肉质嫩、鳞油鲜，除细刺多外，乃不可挑剔之珍馐美味。对于鲇鱼多刺这个缺点，张爱玲甚至把之列为人人生三恨之一：一恨鲇鱼多刺，二恨海棠无香，三恨红楼梦未完。无独有偶，有这种“恨”的不只她一人，早在北宋年间，名士刘涓子就有平生所恨者五事之说：一恨鲇鱼多骨，二恨金橘太酸，三恨蔬菜性冷，四恨海棠无香，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诗。鲇鱼多骨刺亦位列第一恨。当然，张爱玲之“三恨”应是踵袭自刘涓子“五恨”之说。

鲇鱼因是时鲜，且出水即死，无鳞、血不鲜，故不宜长途贩运，此亦居长江边之人的口福。但对今天的人们来说，这一切都只是一个遥远的记忆了。

徐悲鸿致白石老人此札所言之“清江鲇鱼”，乃湖北清江所产，当时北京宴客、馈赠多此也。如1958年，中央实验话剧院在颐和园听鹧鸪请客，主宾是陈毅，陪客是周恩来总理，席间便有清蒸清江鲇鱼。